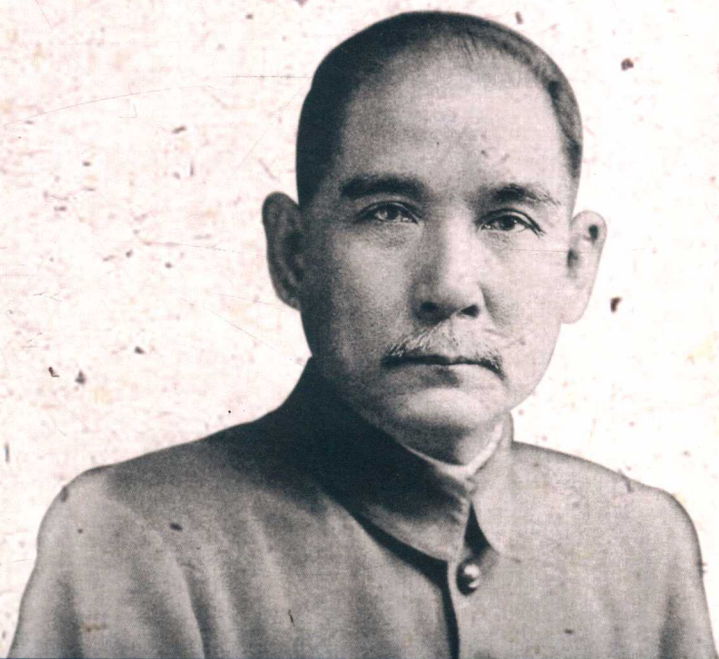




杨天石评说近代史



民初政局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杨天石评说近代史

民初政局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初政局/ 杨天石著.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5. 9
(杨天石评说近代史)
ISBN 978-7-5177-0307-5

I. ①民… II. ①杨… III. ①中国历史 - 近代史 - 研究 IV. ①K250.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9597 号

书 名: 民初政局

著作责任者: 杨天石

出版发行: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77-0307-5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83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联系电话: (010) 88919581 68990692

购书热线: (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络订购: <http://zgfcbs.tmall.com//>

网购电话: (010) 88333349 68990639

本社网址: <http://www.developress.com.cn>

电子邮件: 370118561@qq.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 请向发行部调换

新 序

毛泽东 1935 年 10 月所作《念奴娇》词云：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毛泽东此词写的是亚洲中部的大山系，也是中国西部山系的主干昆仑山。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横贯新疆、西藏之间，蜿蜒伸展至青海境内，全长 2500 公里，平均海拔 5500~6000 米，宽 130~200 公里，总面积达 50 多万平方公里。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它被称为“万山之祖”，又被视为中华“龙祖之脉”。毛泽东在词中描写了它的雄伟阔大的气势和悠远绵长的历史，叙述了它对中华大地、中华民族的“功罪”，慨叹于“谁人曾与评说”。

昆仑山可以“评说”，历史、中国历史、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何尝不可以“评说”？

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的老祖宗一样重视历史。历史被认为是正衣冠、知美丑的镜子，是辨善恶、考得失、增经验、长智慧的教科书，因此，它应该被人“评说”，任人“评说”，特别是自由“评说”。

首先是“说”。历史已逝，看不见，摸不着，只有靠历史学家“说”，用嘴、用文字或用图像，它才能广为人知，传之久远。历史学家要充分掌握资料，精细考辨，力争说得真实、准确、全面，尽最大可能符合历史本来面目，不能“胡说”。“胡说”的结果必然谬种流传，贻误读者。其次是

2 杨天石评说近代史

“评”。“评”能表现历史学家的理解、议论和价值判断。在“说”与“评”之间，“说”最重要。“说”是基础，只要“说”得真实、准确，广大读者都可以根据你所“说”的史实，做出自己的判断和评论。这一方面，我们要高度相信读者。多年来，我是主张先“说”后“评”、多“说”少“评”，甚至可以只“说”不“评”的。最不应该的是，不把史实说清楚、道明白，就急于将自己的评论强塞给读者。至于为了某种功利的需要或某种目的，有意掩盖、“虚无”、扭曲、夸大部分史实，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史实”，那就更等而下之，应该坚决反对了。

世无超人，现实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和不足。任何人都不可能一次就认识全部真理，同样，历史学家也不可能一次就认识全部历史真相。历史学家所“说”、所“评”，都可能不当、不妥、不全，甚至大谬不然。怎么办？百家争鸣呗！毛泽东所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艺术和学术的唯一办法，是清除谬误、探索真理的正确途径。利用行政权力，强制推行一花、一派、一种观点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

如果从1958年选注《近代诗选》开始计算，笔者从事近代史研究已经57年。如果从弃文从史，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起计算，也已经37年。笔者所写论文、札记曾选编为“杨天石近代史文存”五卷本出版。出版后此套书一再加印，甚至被盗版。由于这套书部头大，读者捧起书像捧起一块大砖头，颇多不便，因此，台湾地区风云时代出版公司曾以“揭开民国史真相”为总题，改出七卷本。现在中国发展出版社以“风云版”所分为据，稍作调整，仍为七卷。应该说明的是，笔者2009年以后所作，因另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二辑、第三辑等专书，本套书暂未收入。

书中“评说”难免谬误或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教。

杨天石

2015年8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

原 序

人们生活在今天，规划并创造明天，自然希望了解昨天。昨天就是历史，一切过去了的都是历史。

了解历史的最重要的办法是阅读历史著作。自然，这样的历史著作必须是真实的、客观的、公正的。假的或掺了假的历史著作，人们不会愿意看；讳饰或有所讳饰的历史著作，人们也不会乐意看。但是，历史著作要达到真实、客观、公正，并不容易。这是由于：其一，历史创造者的活动常常具有诡秘性，许多事件，策划于密室，进行于幕后，公开者、示人者往往一鳞半爪，半真半假，甚至全假。其二，历史本质的显露需要一段过程，在这一过程尚未终结之前，人们一时还难以全面认识其本质。其三，历史创造者分为不同的派别，各有不同的立场、观点，即使对同一事件，也常常会有不同的陈述和评价。其四，历史的记录者大都有自己的倾向、爱憎，其记录自然也难免反映这种倾向和爱憎，有某种偏见、局限、谬误、片面性在所难免。其五，许多事件没有记载，或挂一漏万，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以，研究历史难，写出真实的、客观的、公正的历史更难。历史学家的可贵就在于能克服上述种种困难，尽最大可能为世人记录、再现、还原真实的历史本相。达到了这一境界，就达到了历史科学的基本要求。

然而，在现实中，人们常常并不将历史学看作科学，而是将之视为工具——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或者是一种宣传工具。例如政治家常常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利用历史来宣扬本派主张的正确，批评对立派别的谬误，或者

2 杨天石评说近代史

用来宣扬某种于己有利的观点，以期影响社会，塑造舆情，争取群众，为己服务。权力机构会为史家规定这样、那样的禁律：什么可以写，什么不可写；必须如何写，不能如何写之类。其结果是：有利于某派或某种需要者，张扬之，放大之，变造之，奖掖之；不利于某派或某种需要者，隐匿之，缩小之，扭曲之，禁绝之。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历史，往往妍媸随意，美丑随时，真正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哪里有真实可言，哪里有科学可言！

当然，历史学必须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服务。中国古代讲究经世致用，于史学，则特别强调其“资治”功能，这都是不错的。历史学如果不能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要它何用！因此，本书著者赞成史家关注现实，“经世”“资治”，从这个意义上，著者肯定“工具”说的合理内涵，但是千万要注意，史学的这种功能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符合历史的真实和本质，无论如何不能也不应该违背历史，不能故意扭曲、剪裁历史以为己用。有些人常常不懂得，人们可以被蒙蔽于一时，但却不会被蒙蔽于永远。扭曲者有时会取得某种效果，但有时则反，其效果等于零，甚至是负数。林则徐有诗云：“青史凭谁定是非？”从人类发展的长河来看，历史的真相会大白，是非也会有公论。

本书著者年轻时志在文学，但造化弄人，最终走上了研究历史的道路。一转眼已经三十余年。面对历史学的汪洋大海，常生“去日苦多，所成无几”之叹。不过，有一点可以告慰读者的是，本书著者一贯以揭示历史奥秘、追求历史真实为鹄的，决不做讳饰历史、扭曲历史的勾当。当然，由于本书著者的局限，书中各文又成于多年中，自然也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问题甚至谬误，诚恳地希望专家、读者指正。民国史充满着政治斗争，治民国史有其特殊的困难。在这个领域内，政治的干扰和影响最多，未经厘清的史实最多，观点的对立和分歧也最多，本书著者的希望是：在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下，海内外学界切磋讨论，问难攻防，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使民国史著作的科学水平日渐提高，逐渐臻于真实、客观、公正。

著者

2009年8月3日于北京九华山庄

目 录

辛亥革命与共和知识分子 ——对一种传统观点的质疑	1
-----------------------------------	---

辛亥革命时期的共和知识分子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力量，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前所未有的类型。他们既部分代表，又不完全代表中国民族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这一社会力量的出现立即使中国历史出现了新特色。

孙中山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	15
---------------------	----

孙中山严厉批评资产阶级，主张“节制资本”，批判法、美等西方“共和国”。与其将孙中山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家”，不如定性为“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或“平民革命家”为妥。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前途 ——兼论清末民初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批评	20
--	----

孙中山不断思考，不断探索，也不断前进。尽管他一生都没有超出主观社会主义的水平，但他的有关思想中包含着应该为无产阶级政党所珍视的积极的、合理的内核。

“取那善果，避那恶果”

——略论孙中山对资本主义的态度…………… 42

“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资本主义在开出灿烂的近代文明之花的同时，也结出了令人憎厌的丑恶之果。孙中山既要继承资本主义的善果，又要避免资本主义的恶果，他为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原则。

“天下为公”——孙中山的伟大思想遗产…………… 48

孙中山利用《礼运》篇的传统思想资料，又根据时代特点和时代需要赋予新内容。经过孙中山的阐释，“天下为公”这一思想已经大为丰富，广为人知，成为世界思想宝库的重要内容。

国家统一——孙中山奋斗的伟大目标…………… 52

孙中山将恢复和保持国家统一视为“头等大事”和“根本要图”，是关系“中国存亡”和“长治久安”的大问题，因此，坚决反对分裂国家或有可能导致分裂国家的种种主张。

孙中山思想的现代价值…………… 56

一切思想家都立足于他所处的时代，回答那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孙中山思想具有现实针对性，但是，其许多部分又具有超时代的意义，可以长期成为中国人民的珍贵思想营养。

为有炮声动地来

——清末报纸对武昌起义的反应…………… 66

由于办报人的观点、态度、识见彼此相异，因此，对武昌起义的反应也就各不相同。

汤化龙密电辨讹…………… 77

武昌起义前后，立宪派首领汤化龙曾被视为“反革命两面派”，众口相传，几曾铁案。事实证明，汤化龙并未与人串联，阴谋推翻湖北军政府，旧说只是讹传。

康有为的联满倒袁计划

——读台湾地区所藏梁启超未刊函稿 93

政治斗争中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敌人。戊戌政变后，分化不仅表现于康、梁之间，而且更广泛地表现于昔日的维新、保皇党人之间，各派政治力量正在围绕着辛亥革命这一大主题重新组合，酝酿着新的角逐和斗争。

黄兴致井上馨函回译及解读

——读日本井上馨文书 102

黄兴写信给日本人井上馨等，希望他们“以鼎力扶助民国，早邀各国之承认。”然而，井上等并没有给予黄兴以急需的帮助。日本政府不肯承认南京临时政府，日本财阀也不肯提供大笔资金相助。

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 111

为了筹措北伐经费，进军北京，彻底推翻清朝政府，孙中山曾主张向日本“租让满洲”。这是事实。需要从他的思想和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分析，而不必讳言。历史家所追求的只有真实和真理。对孙中山如此，对其他历史伟人也应该如此。

孙中山与民国初年的轮船招商局借款

——兼论革命党人的财政困难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125

一个政权要运作，必须有足够的经费；一个军事战役的发动，也必须有足够的军饷和武器。这个问题不解决，任何英雄都无法在政治舞台上导演出有声有色的话剧来。不幸，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就碰到了这个问题。

华俄道胜银行借款案与南京临时政府危机 143

华俄道胜银行借款草约是一杯毒酒，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的成员未尝不清楚，其结果是不仅未能对现状有任何一点改善，引来了更多的攻击和反对，陷入更大的困境中。

在华经济利益与辛亥革命时期英国的对华政策 150

英国在华有巨大的经济利益，自然不能听任其利益毁于炮火，自然会急切地要求南北停战，也必然会要求在中国建立一个能够维护其利益的政府。辛亥革命时期，英国之所以支持袁世凯，其原因在此。

陈其美的“三次革命”设想

——读日本外务省所藏陈其美致杨以均密函 167

“二次革命”，全军覆没，陈其美立即策划“三次革命”。陈其美不仅表现出反对专制、维护共和的坚定性，而且表现出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斗争意志，因此，中华革命党期间，孙中山非常重视他。

黄兴与日本驻旧金山总领事的通讯

——读日本外务省档案 177

黄兴曾因胶州湾（青岛）问题致函日本驻旧金山总领事，谴责德国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表示对正义事业终将胜利的信心，但其主旨则在于婉转而坚决地要求日本政府将胶州湾归还中国。

“真革命党员”抨击黄兴等人的一份传单

——读日本外务省档案 180

自同盟会成立起，中国革命党人中已经闹过两次矛盾。若是都如“真革命党员”一样猛烈对阵，相互攻击，或者视为“路线之争”，吵嚷不已，事情就麻烦了。

跋钟鼎与孙中山断绝关系书

——官崎滔天家藏书札研究 187

只要革命的大目标相同，那么，总是应该走到一起来的。钟鼎发布与孙中山断绝关系书，有对中华革命党组织原则的不满，有因日本报纸所刊消息而造成的误会，也可能还包含着某些个人情绪在内。

何天炯与孙中山

——宫崎滔天家藏书札研究 196

何天炯一生和孙中山的关系曲折，有合作，有矛盾，但革命同志之间，贵在顾全大局，在坚持革命的长途消融矛盾，共同提高。这一方面，何天炯与孙中山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邓恢宇与宫崎滔天夫妇

——宫崎滔天家藏书札研究 215

追随孙中山进行中国革命的日本浪人情况复杂，目的各异。其中，宫崎滔天夫妇真诚地怀着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他们真心实意地帮助中国革命，是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党人的真正朋友和支持者。

袁世凯伪造的孙中山“卖国协约” 234

袁世凯想当皇帝前后，曾经散布过几种宣传品，大肆攻击和诬蔑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其目的大概是：自己想当皇帝，便说孙中山想当国王；自己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便说孙中山与日本签订二十条。

李大钊致佚名氏密札试解

——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236

对抗与调和、斗争与妥协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能没有对抗与斗争，也不可能没有调和与妥协。在近代思想史上，李大钊比较早地看到了“调和”在自然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宋嘉树与孙中山、宋庆龄的婚姻

——读宋嘉树复孙中山英文函 240

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姻不仅受到孙中山的同志和战友的反对，而且受到宋庆龄父母的反对。

孙中山与田中义一

——读日本山口县文书馆档案 250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教训，孙中山终于对田中，也对当时日本政府的政策有了认识。在对日本当局愈益失望之后，孙中山的目光就更多地投向社会主义的苏俄了。

孙中山的一次北京未遂之行

——读台湾地区党史会藏段祺瑞函 254

孙中山之所以不肯即时入京，原因较多。北京段政府的所作所为逐渐使孙中山失望，自然，原定访问北京的计划也就取消了。

徐致靖大骂梁启超

——读台湾地区所藏徐致靖未刊函札 257

政治斗争中，双方因政见不同，难免意气用事，攻击过头。史家们必须超脱于双方之上，根据历史条件独立判断。如果取其中一方之说以论定另一方，那就离事实很远了。

北京政府致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电

——读顾维钧档案 261

在人民群众和列强的天平之间，北京政府是倾向于列强的。“对于日本方面，似亦以稍表联络，勿过冷淡为宜”，徐世昌、钱能训们不敢得罪日本侵略者的心理，暴露得很清楚。

段祺瑞对日《秘密意见书》

——读日本山口县文书馆档案 271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推行侵华政策，中国人民昂扬着强烈的反日情绪，这种情绪是正当的、爱国的，然而段祺瑞却称之为“国民对日之误解及偏见”，表示要加以“泯除”。

潘佩珠与中国

- 读越南《潘佩珠自判》 274

潘佩珠是寄希望于中华革命的越南爱国者，先后在中国建立越南光复会、振华兴亚会，改建越南国民党，和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蒋介石都有密切关系。

中韩爱国志士的早期联系 287

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帝国主义者成为中韩两国的共同敌人。大批韩国爱国人士流亡中国，开展抗日复国斗争，成形“韩国独立运动”。他们关心、支持中国人民的爱国斗争，中国革命党人则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予韩国志士以积极的帮助。

辛亥革命与共和知识分子

——对一种传统观点的质疑

辛亥革命是谁领导的？多年来的回答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此密切相连的问题是：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是什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代表哪一个阶级的利益？通常的回答是民族资产阶级，或曰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我以为，这些回答都不准确。

那么到底谁是这一革命的领导力量呢？答曰：倘不从某些既定的概念或原则出发，而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答案其实是十分清楚而明白的。这就是，那个时期出现并形成的共和知识分子是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这个问题搞清楚了，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革命党人代表哪一个阶级利益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试说其理由。

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状况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洋务运动期间开始出现，戊戌维新前后略有发展，但是到了辛亥革命前夜，仍然十分微弱。早些年有学者关统计，够得上称为近代企业的不过 500 家左右。近年来有学者重新作了统计，数字有所扩大，但也不过 1000 家左右^①。这 1000 家左右的近代企业能够产生

^① 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1 页。

2 民初政局

多少资产阶级分子呢，充其量不会超过1万人吧？如果加上具有近代特征的新式航运业、金融业和商业，资产阶级分子的数量会大一些。有人根据1911年各地商务总会的会员数和商务分会会董数，约略估计当时民族资本家的数字为52630人^①。但是，商务总会的成员和分会会董的情况很复杂，难以一概视为近代意义上的资本家。即使上述数字大体准确，对于幅员广大的中国说来也仍然是十分微弱的。当时，这一阶级不仅人数不多，经济力量薄弱，而且对政治的影响力极为有限。这样一支队伍怎么可能会领导像辛亥革命这样具有广阔规模的全国性革命呢？我们不能任意地扩大资产阶级的队伍，不能把当时出现的新型知识分子，包括学生、教员、企业雇员以及记者、医生等自由职业者一概视为资产阶级，更不能把旧式商人以至小业主视为资产阶级。我赞成丁日初教授的观点，不笼统地说资产阶级，而说资本家阶级，这样可以有一个严格的界定，不至于把资产阶级扩大化，易于进行科学的讨论。

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民族资本家阶级是否可以分为上层和中下层呢？从理论上当然可以分，但是实际上却很难分得清楚，似乎迄今也还没有人做过仔细的区分和精确的定性与定量研究。上层资本家阶级通常以张謇为代表，那么下层呢？通常以禹之谟为代表（其实，禹之谟办的只是手工作坊，目的在于掩护革命）。除了禹之谟还有谁，似乎不大好找了。如果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话，那么代表就不能是一个、两个，一个、两个怎么能构成阶级基础呢？其实，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的话，就会发现，辛亥革命前夜的中国民族资本家阶级内部在政治态度和政治主张上并无鲜明的分歧，并且是颇为一致的。这就是，参加某些具有反帝爱国性质的运动，如抵制美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等。在政治上，他们一般反对革命，主张君主立宪，求稳怕乱，是立宪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只是到了清政府镇压国会请愿运动，建立皇族内阁之后，他们才对清政府感到绝望，个别人如沈缙云才转向革命。武昌起义之后，

^① 黄逸峰、姜铎等：《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88页。

这个阶级才附和革命。但是，他们仍然怕乱求稳，畏惧革命党人的激烈言论和行动。其结果，在孙中山和袁世凯之间，他们选择了袁世凯。二次革命期间，除沈缙云等少数人外，他们更抛弃了孙中山，赞成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镇压。在以后的年代里，我们也未见有多少资本家阶级分子试图影响孙中山等人的政策并予以大量财力支持（华侨资产阶级有支持孙中山的，也有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应作别论）。

多年来，我们习惯于简单地以经济地位来划分政治派别，或者简单地以经济地位来说明政治态度。似乎“大”“上层”就一定反动，而“中”“小”“下层”就一定进步点。例如，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学者有所谓“中小地主阶级”说，似乎王安石等改革派、岳飞等主战派，杜甫、白居易、陆游等同情人民疾苦的诗人都是“中小地主阶级”或“地主阶级中下层”的代表，其实，历史的真相何尝如此！乡村里的中小地主剥削起农民来一点也不比大地主轻，抗日战争中，给日本人当汉奸、狗腿子的恐怕中小地主不少吧！这种地主阶级中下层进步说和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进步说都不是从历史事实中抽象出来的科学理论，而是根据某些概念、原则，主观演绎的结果。

关于共和知识分子

辛亥革命前夜，中国社会逐渐出现几种热潮，这就是留学热、办新式学堂热、出版新式书刊报纸热，由于这些原因，中国社会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有些学者称为群体），这就是新型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发展很快，数量很大，试看下列数字：留学生，1903年为1300人，1904年为2400人，1905年为8500人，1906年13000人；国内新式学堂学生，1907年为101.3万余人，1908年为128.4万人，1909年为162.6万余人。较之民族资本家阶级说来，这是一支数量较大、政治上更为活跃的社会力量。

和传统的封建知识分子比起来，他们有若干特点：

(1) 具有近代科学知识。从知识结构的主体看，不再是子曰诗云，而